

【杨绛作品摘录】



《干校六记》，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，封面由丁聪设计。

## 《干校六记》出版前后

我请杨先生谈谈《干校六记》创作的经过。

杨先生说：“干校回来，我很感慨，想记下点干校的事。《干校六记》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，是读了《浮生六记》才决心写的。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《浮生六记》的样。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，自信这部《六记》，超出我以前的作品，所以，我动笔前告诉钟书，我要写一篇《干校六记》，他泼冷水说：“写什么《六记》！”他说没用，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。我写完后给他过目，他不声不响，立即为我写了一篇‘小引’，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，不是敷衍。平时他矢口否认敷衍，我总不大相信，因为他经常敷衍人，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。他对我请看文章，总很为难。他若说我好，我不信；如果文章不好，他批评不好，又怕伤我。

“这部《六记》当时在大陆不好出，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，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，他自己又不敢用。后来香港《广角镜》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，‘你再不寄，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’。范用只好寄出稿子，李国强亲自下印厂，一星期内就出版了。

“《干校六记》，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，不会出版的。他不知怎么看到了，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，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。同时，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，又对赴宴的钟书如此说，并说了十六字考语：‘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缠绵悱恻，句句真话。’”

(摘自吴学昭《听杨绛谈往事》，三联书店出版)



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

## 《干校六记》记述干校生活 误传记妄

□杨绛

这年年底，默存(钱钟书字默存——编者注)到菜园来相会时，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传闻。

默存在邮电所，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，寻出偏僻的地名，解决不少问题，所以很受器重，经常得到茶水款待。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“茶”，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。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。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，叫干校遣送一批“老弱病残”回京，“老弱病残”的名单上有他。

我喜出望外。默存若能回家，和阿圆相依为命，我一人在于校就放心释虑；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。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，尽管夫妻不在一处，也享不到这个权利。

过了几天，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，破例过河来看我，特来报告他传闻的话：回北京的“老弱病残”，批准的名单下来了，其中有他。

我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，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。过了几天，他来看我时脸上还是静静的。我问：

“还没有公布吗？”

公布了。没有他。

他告诉我回京的有谁，有谁。我的心直往下沉。没有误传，不会妄生希冀，就没有失望，也没有苦恼。

我陪他走到河边，回到窝棚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，心上反复思忖。

默存比别人“少壮”吗？我背诵着韩愈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诗，感触万端。

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。这份材料若没有“文革”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，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。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：钱某要说这话，一定还说得俏皮些；这语气就不像。有人向我通风报信；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。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、有个影，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。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，我立即把这事告知默存。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，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；两人忙忙吃完晚饭，就带了一瓶糍糊和手电到学部去，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大字报下面。第二天，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。可是事后知道，大字报所控确有

## 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关注命运与人生

### 人能做主吗

□杨绛

既然人生有命，为人一世，都不由自主了。那么，“我”还有什么责任呢？随遇而安，得过且过就行了。

人不能自己做主，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。回顾自己一生，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，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，或由性格决定，或由自由意志，值得追究。

抗日胜利后，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。钟书一口拒绝不要。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，为什么一口拒绝呢？钟书对我解释：“那是胡萝卜。”他不受“胡萝卜”的引诱，也不受“大棒”的驱使。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。但他“不吃胡萝卜”是他的性格，也是他的自由意志。因为在那个时期，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。要有他的聪明，有他的个性，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。

抗日胜利不久，解放战争又起。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。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。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，都是形容苏联“铁幕”后的生活情况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，所以我们不免害怕。劝我们离开祖国的，提供种种方便，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。出国也不止一条路。劝我们留待解放的，有郑振铎先生、吴晗、袁震夫夫妇等。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。这话我们相信。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。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。我们考虑

根据：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。这项“告发”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。实地调查时，那“告发”的人否认有此告发。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，可是查无实据。默存下干校之前，军宣队认为“告发”的这件事情情节严重，虽然查无实据，料必事出有因，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。默存只好婉转其辞，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。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。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，我就说：“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。”默存说我无聊，事情已成定局，还管它什么作祟。我承认自己无聊：妄想已属可笑，还念念在心，洒脱不了。

回京的人动身那天，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。客里送人归，情怀另是一般。我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，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：“走！咱们回去！”我就跟她同回宿舍；她长叹一声，欲言又止。我们各自回房。

回家的是老弱病残。老弱病残已经送回，留下的就死心塌地，一辈子留在干校吧。我独往菜园去，忽然转念：我如送走了默存，我还能领会“咱们”的心情吗？只怕我身虽在干校，心情已自不同，多少已不是“咱们”中人了。我想到解放前夕，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，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？思想进步吗？觉悟高吗？默存常引柳永的词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，撒不下“伊”——也就是“咱们”或“我们”。尽管亿万“咱们”或“我们”中人素不相识，终归同属一体，痛痒相关，息息相连，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。我自惭误听传闻，心生妄念，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，且求独善我家，不问其他。解放以来，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，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。

默存过菜园，我指着窝棚说：“给咱们这样一个棚，咱们就住下，行吗？”

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：“没有书。”

真的，什么物质享受，全都罢得；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。他箱子里只有字典、笔记本、碑帖等等。

我问：“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？”

他说：“时光倒流，我还是照老样。”

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，好像未经思考的；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。我不免思前想后，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。既然是自己的选择，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，到此也就死心塌地，不再生妄想。

再三，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，料想安安分分，坐坐冷板凳，粗茶淡饭过日子，做驯顺的良民，终归是可以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不是不得已。

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，可说是命。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，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。当初说定半年，后来延长至一年。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。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。做下去是千顺百顺，辞职是逆水行舟，还兼逆风，步步艰难。但是我硬是辞了。当时我需要工作，需要工资，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，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。这不是不得已，是我的选择。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，就是顺从她的期望，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。我是想从事创作。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，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。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，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。绝不是命。

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，都是当时处境使然，不由自主。但是关键时刻，做主的还是自己。算命的把“命造”比作船，把“运途”比作河，船只能在河里走。但“命造”里，还有“命主”呢？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，船里还有个“我”在做主，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。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。烈士杀身成仁，忠臣为国捐躯，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？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，宁死不屈。如果贪生怕死，就不由自主了。宁死不屈，是坚决的选择，绝非不由自主。做主的是人，不是命。

【关于翻译】

译著《堂吉珂德》被批“反面教材”

## 杨绛平和应答，希望化“误解”为“了解”

2005年恰逢世界文学名著《堂吉珂德》问世四百周年，《堂吉珂德》中译本据称多达一二十种，其中一位译者董燕生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：“不畏前辈权威，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”，董燕生说，“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”，“她太自信了，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”；他还批评杨绛译本中“胸上长毛”、“法拉欧内”、“阿西利亚”等译法，并指责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，“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”。最后他说：“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，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。”

《堂吉珂德》中译本中影响最大、发行量最大的杨绛译本，被指责为“反面教材”，引起了各方的关注。

2005年9月2日杨绛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声明，希望化“误解”为“了解”——

今天我在《文汇报》上看到《……驳斥译坛歪风》的文章，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了。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，完全正确，说不上“歪风”。世间许多争端，往往出于误会。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，可惜我生得太早，已成了他的“前辈”。他“不畏前辈权威”，勇于指出错误，恰恰是译界的正风，不是歪风。媒体传言，一传再传，往往失真。董先生要把我的译文“当反面教材”云云，引起了李景端先生的误解，他评董先生的文章里，把“反面教材”夸大了，说成是“文革”时的语言。因而又引起许多朋友们为我仗义执言，我很感激。但是我认为不应该让“误解”发展，该及早解释清楚。

董先生说：“太自信，该查字典的地方不去查字典”。这是董先生误解了我。我有一本1966年出版的《简明西汉词典》，全书只薄薄375页。董先生提的那两个字，词典里没有。那时出版社还没有统一的人名、地名，译者都按自己的读音译音。(拙作《文集》出版前，“法老”等错译已改正。)当时我买不到适用的西汉词典。我用的是María Moliner编的《西班牙语辞典》二厚册，还有厚厚一册《带图解的西班牙语辞典》，都是用西班牙语解释的。遇到不识的字，得查《西英大辞典》。三个月前，我因拙作《文集》将第三次印刷，忙将《堂吉珂德》又校订一遍，改正了一些错误，但忽略的错误，想必还难免。

“点烦”云云，是我大胆尝试。这是一道艰巨的工序。一下子“点”掉十来万字，我自己也很吃惊。董先生的误解是完全合理的。不过“点烦”只限译文，不简原文(详见《翻译的技巧》)。究竟这道工序功效如何，还有待译界同人一起商讨呢。

至于“胸口生毛”，我就像小学生般要和董先生解释一下。这个词儿如果出于任何别人之口，该说是错。但桑丘用字往往不恰当，例如把美人的眼睛比作珍珠。堂吉珂德先生就说，“你只能说‘牙如珍珠’，眼睛怎能像珍珠呢！”又如他说某牧羊女嘴上“还长着些胡子”，他用“胸口生毛”的形容词前面还有两个形容词，据编注者马林(Marin)注：桑丘用的三个形容词都适用于男人，用在女人身上都不合适。桑丘引用成语，往往成双成串，紧接“胸口生毛”下的一句也是成语，我也直译了。成语直译，“纸老虎”就是一例。如果西语专家、行家们都认为“胸口生毛”不能直译，我当尊重专家、行家的意见酌改。

匆匆解释几句，希望化“误解”为“了解”。我真心诚意地声明：我是一个很虚心的译者，对自己的译文一改再改，总觉得不好。希望专家行家们多多指教。



1983年11月应西班牙驻华大使邀请，杨绛到西班牙作学术访问，在马德里塞万提斯故居留影。